

支婁迦識譯《般舟三昧經》 三個新見版本考

釋覺心

中華佛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38 期 頁 1-56（民國 115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8, pp. 1-56 (2026)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53106/199680002026060038001

ISSN: 1996-8000

摘要

本文聚焦於後漢·支婁迦讖所譯《般舟三昧經》之版本問題，針對過往學界僅關注《再雕藏》與《宋元明》兩系版本的局限，提出三個新見版本——《校正別錄》所載「宋本」、《趙城金藏》之「金本」、《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之「初本」。透過新舊版本的比對分析，結合漢文大藏經刊刻史之考察，本文重新檢視 Paul Harrison 於 1990 年提出「A 本」（支婁迦讖原譯）與「B 本」（後人改譯）融合與分界點的推論，進而重構《般舟三昧經》版本系譜。研究結果歸納出三個重要發現：第一，「宋本」和「金本」前四品皆為「長行」，比「再雕本」更接近支婁迦讖原譯形態；第二，《般舟三昧經》諸多版本之形成，源於長期反覆校訂的過程，其演變可勾勒為：「宋本」→「金本」→「東本」、「北本」、「再雕本」→「初本」→「宋元明本」；第三，Harrison 假設的「A 本」可能從未存在，「再雕本」前三品半與其後體例的不一致，或反映出一個尚未完成校訂的過渡版本。本文為《般舟三昧經》的版本源流提供嶄新視角，並在一定程度上補足了當前學界的研究缺環。

目次

一、問題之所在

二、漢文刻本《大藏經》系譜

（一）歷代漢文《大藏經》

（二）漢文《大藏經》之兩種系統說

三、《再》與《宋元明》兩個舊版本

（一）序分

（二）長行與偈頌

（三）遣詞用字

四、《校正別錄》與《趙城金藏》的新發現

（一）高麗·守其《校正別錄》（K1402）

（二）「宋本」、「東本」、「北本」所屬大藏經

五、新舊版本之比對

（一）〈問事品第一〉之異文比對

（二）〈行品第二〉之異文比對

（三）〈四事品第三〉之異文比對

（四）〈譬喻品第四〉之異文比對

六、結論

關鍵詞

支婁迦識、般舟三昧經、版本、校正別錄、趙城金藏

一、問題之所在

《般舟三昧經》（*Pratyutpanna-samādhī-sūtra*）是一部初期大乘典籍，旨在教導行者透過念佛入三昧，從而得見十方現在諸佛。此經的集出年代可追溯至西元 1 世紀左右（釋印順 1981，850-851；Harrison 1990, xvii）。由於經文中明確提及阿彌陀佛，故有學者推測其集出地應為當時盛行彌陀信仰的北印度地區（釋印順 2005，274）。然而，其完整梵本早已佚失，今僅存一頁梵文殘片及一份包含七個碎片的犍陀羅語寫本（Hoernle 88-93；香川孝雄 199-203；山田龍城 270；Harrison 1990, 273-302；Harrison et al. 117-143）。儘管如此，該經透過一部完整的藏譯本與四部漢譯本得以流傳至今，在漢、藏佛教傳統中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藏譯本由 Śākyaprabha 和 Ratnarakṣita 譯於 9 世紀，名為 ‘*Phags pa da ltar gyi sangs rgyas mngon sum du bzhugs pa'i ting nge 'dzin c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Harrison 1978, 40；林純教 261-262）。Harrison 於 1978 年以德格版為底本，校以奈塘、北京、拉薩版，出版為羅馬轉寫的校訂本，名為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ī-sūtra*。1990 年，他又據此校訂本進行了英文譯注。另外，林純教曾以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中的《般舟三昧經》為底本，參考現存四部漢譯及 Harrison 的藏譯校訂本，將之譯為日文，且對漢、藏譯本進行了比較

* 收稿日期：2025.6.22；通過審核日期：2026.2.2。

本文改寫自筆者博士論文一章：釋覺心，〈《般舟三昧經》之起源與傳播研究〉，2022 年，法鼓文理學院，博士論文。此博論獲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聖嚴漢傳佛教博士論文撰寫獎助」。

研究（林純教）。

依據《開元釋教錄》的記載，《般舟三昧經》曾有過七次漢譯。¹ 儘管如此，現存漢譯本只有四部，包括：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般舟三昧經》一卷²、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三卷³、後漢·失譯《拔陂菩薩經》一卷⁴、隋·闍那崛多譯《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五卷⁵。望月信亨曾述及現存漢譯諸本的傳譯概況（望月信亨 11-12）。西義雄則針對四部漢譯本之間的共通文脈進行研究，並探討其背後的意義（西義雄 1265-1286）。現存四部漢譯之中，問題最多的是支婁迦讖於 179 年譯出的《般舟三昧經》。

依據櫻部建及 Harrison 的研究，《般舟三昧經》有兩種版本，一者收於《再雕高麗藏》（以下簡稱《再》），二者收於宋《思溪藏》、元《普寧藏》、明《嘉興藏》（以下統稱《宋元明》，或分別簡稱為《宋》、《元》、《明》）（櫻部建 173-180；Harrison 1990, 221-249）。兩種版本的差異，清楚寫在《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的校勘欄上。根據這些資料，Harrison 分析出《般舟三昧經》雖有十六品，但《再》的〈問事品第一〉至〈譬喻品第四〉前半段屬於支婁迦讖原譯，稱之為「A 本」。除此之外，《再》的〈譬喻品第四〉後半段至經文結束，以及整部《宋元明》乃支婁迦讖之後修訂或改譯而成，稱之為「B

¹ 《開元釋教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頁 588 下 -589 上。

² 《佛說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7 號，頁 897 下 -902 下。

³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2 下 -919 下。

⁴ 《拔陂菩薩經》，《大正藏》冊 13，第 419 號，頁 920 上 -924 中。

⁵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大正藏》冊 13，第 416 號，頁 872 上 -897 下。

本」(Harrison 1990, 221-235, 270-272)。這個結論自 1990 年提出至今，仍受學界肯認，未有其他學者提出新的觀點或找到新材料。⁶對筆者而言，這樣的結論隱藏著一些有待釐清的問題。例如，為何《再》A 和 B 的銜接點會落在第四品的中間，而不從第四品初或第五品初開始呢？這一點顯得不太尋常。根據 Harrison 的推測，這或是早期的大藏經編纂者剛好擁有三品半的 A 殘卷(Harrison 1990, 271-272)。然而，筆者認為除非該編纂者認為 A 本的價值很高或翻譯得很出色，否則何必將之與 B 本結合，破壞其一致性呢？單單依據《再》與《宋元明》，無法完全解答此問題。所幸筆者發現了三個新見版本，應有助於釐清之。

第一個版本見於守其所撰的《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以下簡稱《校正別錄》)。此書記錄了《再雕高麗藏》(以下簡稱《再雕藏》)開雕前的校勘過程。其中提到，守其當時用以校勘的《般舟三昧經》共有三種版本，即「宋本」、「東本」和「北本」，三者之間有些重要差異。儘管《校正別錄》篇幅不長，但其內容對於釐清《般舟三昧經》的版本演變具有重要價值。本文採用的《校正別錄》為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官網所提供的掃描圖檔，其中有許多異體字，同時有些字跡已經模糊或缺損，未經修補，應源自海印寺原版《再雕藏》的印本。⁷

⁶ Harrison 的這份研究雖出版於 1990 年，但它其實是 1979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距今已有四十餘年。

⁷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 515c。依據此圖檔進行研究，比洋裝影印本更可靠。《再雕藏》現有四種影印本：1. 韓國東國大學校於 1957-1976 年陸續出版的《高麗大藏經》(48 冊)；2. 韓國東洋佛典研究會於 1971-1975 年陸續出版的《高麗再雕大藏經》(45

第二個版本，本文稱之為《金》，收於《趙城金藏》（以下簡稱《金藏》）。《金》目前主要有兩個版本：（一）2008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之《趙城金藏》，共122冊，未經校勘。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見於第9冊，頁177-248；（二）1984-1996年間，由中華書局出版之《中華大藏經》，共106冊，以《趙城金藏》為基礎，並參校《房山雲居寺石經》、《資福藏》、《影印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嘉興藏》、《清藏》、《再雕高麗藏》等八種大藏經。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見於第11冊，頁421-467，為本文採用之版本。值得注意的是，《金》之前四品完全採用長行體例，其「序分」與《再》及《宋元明》皆有明顯差異。若依Harrison之觀點，將原典之「偈頌」（又稱「重頌」或「祇夜」〔geya〕，偈前有長行，而以韻文重複其義者）漢譯為「長行」是支婁迦讖的翻譯特徵（Harrison 1990, 232），那麼《金》之前四品豈非可視為支婁迦讖原譯？這一點，對於《般舟三昧經》之版本研究可謂是重要發現。

第三個版本，本文稱之為《初》，收於《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以下簡稱《初刻本》），由西南師範大學、人民出版社共同於2012年出版，全88冊。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見於第5冊，頁1-22，被視為《初雕高麗藏》

冊）；3. 臺灣新文豐於1971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48冊）；4. 北京線裝書局於2004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80冊）（野沢佳美93）。萬金川曾指出，東國大學出版的48冊洋裝本，製造過程粗糙且時有錯誤，被學者們詬病多時。新文豐出版的《景印高麗大藏經》依據東國大學校本影印，因此錯誤依舊（萬金川2015，109-110）。有關新文豐版《景印高麗大藏經》問題與原因之探討，CBETA輸校組曾寫過一份報告〈《高麗大藏經》影印本問題〉。

（以下簡稱《初雕藏》）之遺卷，乃高麗誠庵古書博物館（Sung Am Archiv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Museum）之藏本。⁸惟《初》僅存卷一，卷二與卷三已佚失，且部分經文已模糊或脫落。儘管《初》卷一只涵蓋前四品，但這四品為該經最核心部分，內含關鍵訊息，有助於釐清《般舟三昧經》的版本問題。此外，雖然《初》被視為「高麗藏初雕本」，但此說法仍有待進一步校勘，才得以確認其真實性。鑑於既有研究多聚焦於《再雕藏》與《宋元明》兩系版本，本文對《校正別錄》、《金藏》及《初刻本》中新見版本的考察，不僅能補足過往研究之闕漏，亦為《般舟三昧經》版本流傳的細節問題提供新的文獻憑據。

本研究採用文獻學方法，透過對《般舟三昧經》文本特徵的系統性分析，探討不同版本的形成與演變歷程（蔡耀明 65-66）。首先，本文依據漢文大藏經的刊刻歷史，釐清各版《般舟三昧經》之底本關係。其次，檢視 Harrison 等學者對《再》與《宋元明》等版本之研究成果，評估其觀點之合理性。最後，本文針對《般舟三昧經》前四品之異文進行比較研究，除《金》、《初》、《校正別錄》外，亦納入《再》⁹、日本宮內省書寮藏本（以下簡稱《宮》）¹⁰、《磧砂藏》的版本（以下簡稱《磧》）¹¹，以及載於《大正藏》校勘記的《宋元明》版，從而歸納它們之間的異同與修訂痕

⁸ 參〈高麗經初刻本存卷數目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委會 322）。

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p. 515c14c23-516b10。

¹⁰ 日本宮內省書寮藏本：《般舟三昧經》，全文影像見於《宮本大藏經》第 1059-1061 帖。

¹¹ 《般舟三昧經》，《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第 69 號，頁 97-112。

跡。藉此，本文擬重建《般舟三昧經》的版本譜系，進一步推演其流傳與演變之軌跡。

二、漢文刻本《大藏經》系譜

（一）歷代漢文《大藏經》

自 179 年譯出以來，《般舟三昧經》受到持續校訂、傳抄與版刻，異文層累，遂使同一譯本分歧漸顯。Harrison 等學者對此譯本的研究，局限於《再》與《宋元明》兩種版本。此一局限，或因當時難以取得其他完整的漢文大藏經，只能參考日本刊行之《大正藏》，並據其校勘注看出《再》與《宋元明》之差異。然而，隨著時代推進，各種漢文大藏經陸續以紙本或電子形式刊行，遂使本文得以進行更全面的考據，從《趙城金藏》、《初刻藏》與《再雕藏》中發現更多未受學界矚目的版本。新舊版本並非彼此孤立，其間多存可辨之傳承關係。若欲釐清之，當從漢文大藏經的刊刻歷史中探求其源流。古今中外所刊行的漢文大藏經不下二十餘種，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寫本、刻本、印本、數位本（方廣鋁 2006，13）。然而，就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十餘種大藏經。¹²

宋代刊刻的大藏經版本最多，包括：1. 蜀版《開寶藏》；2. 遼版《契丹藏》；¹³ 3. 《金藏》，其刻版在元代曾

¹² 關於古今中外歷代漢文大藏經之刊刻歷史與版本特徵，學界已積累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所參考者，包括：葉恭綽 49-66；周叔迦 67-92；李圓淨 93-104；呂澂 1977a，195-206；1977b，207-214；1985，561-563；2003，1-86；蔣唯心 215-270；水野弘元 220-223；Fang 187-215；Li and He 2015，311-320。

¹³ 《契丹藏》早已佚失，但 1974 年在山西省應縣佛宮寺出土 12 卷殘

進行補雕（水野弘元 220-223），同時校正部分經文（萬金川 2019，17）。此藏原已佚失，直至 20 世紀，其遺卷分別於山西趙城廣勝寺（被稱為《趙城金藏》）與西藏薩迦寺出土，包含四種印本：「天寧寺本」和「興國院本」（屬「金刻金印」）、「廣勝寺本」和「大寶集寺本」（屬「金刻元刷」）（李富華、何梅 91-94；萬金川 2019，5、15-19）。其中，「廣勝寺本」收有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惟其字跡多有殘損，北京圖書館曾以《趙城金藏》或《高麗藏》中相同的字句剪貼補全（任繼愈 12）；4. 福州版（又名「閩版」）《崇寧藏》與《毗盧藏》，日本宮內省書寮現存有兩者的合成本，名為《宮本大藏經》；¹⁴ 5. 湖州版（又名「浙版」）《思溪圓覺藏》與《思溪資福藏》；6. 《磧砂藏》，分兩個階段雕成，南宋依《圓覺藏》開雕，元代依《普寧藏》續刻（呂澂 1985，562-563）。元代刊刻的大藏經有兩種：《弘法藏》與《普寧藏》。¹⁵ 明代刊刻的大藏經則有四種：1. 於南京刊行的《南藏》；2. 校訂前者的諸多脫誤，於北京再次刊行，稱為《北藏》；前二藏呈「折疊裝」，不方

片，今輯錄於《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 11-12）。

¹⁴ 《宮本》諸經之全文影像，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¹⁵ 《普寧藏》的印本存世甚多，包括：山東靈岩寺至元 24 年（1287）印本；陝西開元寺、臥龍寺至元 27 年（1290）印本；陝西岐山法門寺、古邠洪福寺、河南興國寺大德元年印本；山西太原大顯聖寺大德 2 年（1298）印本；山西介休包腹山（1304-1314）印本；高麗國王王璋皇慶元年（1312）印本；雲南圖書館延祐 3 年（1316）印本；年代不詳的山西晉城青蓮寺本、南海康氏印本；日本增上寺、淺草寺、圓城寺、東福寺和西大寺等之印本（李富華、何梅 338-344；水野弘元 224）。

便頒布和翻閱，後人改之為「方冊裝」——3.《武林藏》與4.《嘉興藏》（李圓淨 97-98；李富華、何梅 465）。

除此之外，《開寶藏》與《契丹藏》多次傳入高麗（李能和 659；王德朋 5）。¹⁶ 高麗遂得以依據此等刻本開雕自家大藏經。《初雕藏》於 1011-1082 年完成，並於 1090-1101 年進行續雕（顏洽茂 156）。這兩次雕版皆已佚失，現僅存少量印本散見於韓國與日本。《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收錄其中若干遺卷，包括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前四品。此版本雖被稱為「初雕本」，但其真偽仍待進一步校勘以確證。《再雕藏》於 1236-1251 年刻造，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見於此藏第 67 經，其中有許多文句異於《宋元明》。此藏另附《校正別錄》，乃守其領導的團隊對《開寶藏》、《初雕藏》、《契丹藏》及高麗境內流傳諸藏所作的校勘記，其中提及《般舟三昧經》有「宋本」、「東本」、「北本」，為過去學界所未曾重視。

從江戶時代開始，日本亦陸續刊行屬於自己的大藏經，其中最為現代學術界所重視並廣泛使用者，是 1922-1934 年間完成之鉛印本《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 1）。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收於此藏第 13 冊第 418 經，其校勘是以增上寺所藏的《再》為底本，對校增上寺之《宋》、《元》、《明》三本及知恩院藏本（簡稱《知》）。¹⁷ Harrison 等學者於四十餘年前研究此經時，當

¹⁶ 中國三賜大藏經予高麗的紀錄，見《宋史》卷 487，〈列傳第二百四十六·外國三·高麗〉20、22、36 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¹⁷ 參〈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1（高楠順次郎等 256 中 - 下）。「知恩院藏本」包含宋開元寺版 4940 冊、東禪寺版 978 冊、寫本 51 帖（梶浦晉 405）。《大正藏》雖自稱以《再雕藏》為底本，實際校勘時卻用《頻伽藏》（方廣鋁 2015，4-8；石上善

即依據此校勘注，觀察出《再》與《宋元明》之間的差異。

儘管中國、高麗、日本等國刊行的《大藏經》有多種，但只要考察它們各自據以刊刻的底本，便能釐清《般舟三昧經》新舊版本之間的傳承關係。相關資訊，簡要彙整如下（小川貫式 109-124；李圓淨 93-102；任繼愈 2-5）：

表 1：各版漢文大藏經及其底本

漢文大藏經						般舟三昧經
國	朝	版名	代號 / 藏名	起訖年	底本	略符
中國	宋	蜀版	1.《開寶藏》	971-983	?	《開》
		遼版	2.《契丹藏》	1031-1063	?	《丹》
		金版	3.《金藏》	1148-1173	1	《金》
		福州版	4.《崇寧藏》	1080-1104	?	《宮》
			5.《毗盧藏》	1115-1150	4	
		湖州版	6.《資福藏》	1175-?	4	《宋》
		磧砂版	7.《磧砂藏》	1231-1322	4	《磧》
	元	元版	8.《普寧藏》	1269-1286	6	《元》
	明	—	9.《南藏》	1372-?	4	《南》
		—	10.《北藏》	1410-1441	9	《北》
		明版	11.《嘉興藏》	1589-1676	10	《明》
高麗	—	—	12.《初雕藏》	1011-1082	1/2	《初》
			13.《再雕藏》	1236-1251	1/2/12	《再》
日本	—	—	14.《大正藏》	1922-1932	13	《大》

首先，宋代《毘盧藏》至明代《嘉興藏》的底本源流，皆可追溯至福州版《崇寧藏》。其次，高麗《初雕藏》、《再雕藏》及日本《大正藏》的底本源流，可追溯至《開寶藏》與《契丹藏》。第三，關於《開寶藏》、《契丹藏》與《崇寧

應 4；宮崎展昌 225）。2023 年，日本增上寺已將三大藏的掃描檔公佈於網路上（淨土宗大本山增上寺所藏三大藏）。

藏》所依據之底本為何，學界目前存在兩種不同見解。

（二）漢文《大藏經》之兩種系統說

第一種見解主張依地域區分漢文大藏經的傳承脈絡。依日本學者分析，大致可分為三系：1. 北方系，以《開寶藏》為代表，《初雕藏》與《金藏》皆依之覆刻；2. 南方系，包括《崇寧藏》及其後的宋、元、明諸藏；3. 《契丹藏》自成一系（小野玄妙 625-626；竺沙雅章 1-31）。相對於此，方廣錫所提出的三系劃分略有不同：1. 《開寶藏》屬中原系；2. 《契丹藏》屬北方系；3. 《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屬南方系。《金藏》與《初雕藏》雖為《開寶藏》的覆刻，但各具獨立版片，可視為自成體系的藏經（方廣錫 2003，30）。《再雕藏》以《開寶藏》為底本，同時參校《契丹藏》，故兼具中原與北方二系之特色（方廣錫 2012，38）。至於北、中、南三系之形成原因，方廣錫、李際寧、李富華、何梅等人皆認為，是三系藏經分別依四川、中原、福州三地的不同「寫本」而刊刻所致（方廣錫 2003，400；釋知如等 5）。基於此，筆者稱之為「三地寫本各異說」。依方氏觀點，各藏底本關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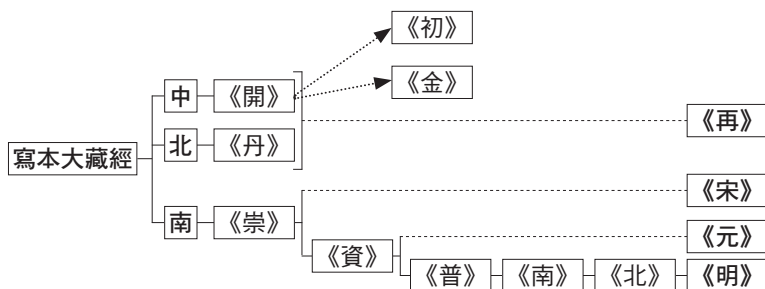


圖 1：三地寫本各異說

以上觀點固然有其道理，但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開寶藏》做為中國第一部刻本漢文大藏經，後來的南北各藏刊刻前，難道未曾以之為參考依據嗎？針對此點，呂澂提出的第二種見解值得注意。

呂澂認為所有刻本大藏經皆導源於《開寶藏》，但此藏並非只有一版（呂澂 1977a，195-205；2003，1-7）。之所以得出此結論，是因為他曾閱覽廣勝寺三百餘卷《金藏》，並與其他刻本大藏經進行校勘，同時「旁參記載，乃畢見其源流」（呂澂 1977a，195）。根據這些「內部證據」，呂澂推斷《開寶藏》自 983 年初雕以來，曾經歷數次改訂並增補新籍，形成至少五種不同時期的印本：1. 淳化本、2. 咸平本（初校）、3. 天禧本（再校）、4. 熙寧本（校定）、5. 崇寧本。

《開寶藏》初印的「淳化本」錯誤頗多，守其於《校正別錄》指出五十餘處。咸平初年（998），《開寶藏》校勘過一次，成為「初校本」，其印本名為「咸平本」。《金藏》以此為底本，故「淳化本」原有的一些錯誤，得到了訂正，但仍未盡除。至「天禧本」時，最初的五十餘筆錯誤大致改正，可稱為「再校本」。乾興年（1022）以後，《開寶藏》再無校改，故「熙寧本」可視為最終的「校定本」（呂澂 1977a，195-203）。

《開寶藏》傳入契丹後，《丹藏》以「天禧本」為底本，《崇寧藏》以「熙寧本」為底本。因此，《契丹藏》於蜀版舊本有改正處，《崇寧藏》亦同改；但《契丹藏》改錯之處，《崇寧藏》或沒錯。《契丹藏》與《崇寧藏》之間並無直接關係，蓋當時的契丹國嚴禁出口書籍，違者處死，所以《崇寧藏》不可能參考《丹藏》。既然如此，兩者之所以相似，只因所依據的《開寶藏》印本相近（呂澂 1977a，204）。

到了高麗，《初雕藏》先以「淳化本」為底本，後改依

《丹藏》。「天禧本」於 1022 年傳入後，高麗便據之補正《初雕藏》部分錯誤。其後，「熙寧本」於 1083 年傳入，高麗再依之補刻《初雕藏》之缺。中國刊刻的《思溪藏》以《崇寧藏》為底本，校以「咸平本」（呂澂 2003，45）。因此，《初雕藏》與《思溪藏》在文句上常有一致之處，乃因所據蜀版之印本相近，並非兩者間存在直接關聯（呂澂 1977a，204）。除了《開寶藏》不同時期印本，呂澂也考慮到寫本帶來的影響：

閩、浙依「蜀版校訂本」，專主玄逸之《廣品歷章》；丹、麗用「蜀版再校本」，而雜以從梵《經源品次》之說。（丹藏從《經源品次》而編定，見「華嚴寺重修薄伽教藏記」）故閩、浙尊《開元錄》寫經，丹、麗尊《貞元錄》寫經，校訂文句，終歸異趣。（呂澂 1977a，204-205）

閩版《崇寧藏》、浙版《思溪藏》以「熙寧本」為底本，又依《廣品歷章》而編定。《廣品歷章》為唐·玄逸依《開元錄·入藏錄》之編次，列記諸經之細目。換言之，《崇寧藏》與《思溪藏》間接參校了《開元錄》之寫經。相對於此，《丹藏》與《初雕》以「天禧本」，同時依據《經源品次》而編定。然《經源品次》是唐·從梵依《貞元釋教錄》而編集。換言之，《丹藏》與《初雕》間接參校了《貞元錄》之寫經。由於所參照的寫經不同，遂形成種種差異。總而言之，各藏之間的差異，主要源於二因：1. 底本為《開寶藏》不同時期的印本；2. 校訂時所據之寫本經不同。

呂澂之後，李富華、顏洽茂、柳富鉉等學者分別從不同研究角度，印證了《契丹藏》、《金藏》、《初雕藏》、

《再雕藏》等依「蜀版五印本」刊刻之見。¹⁸ 以呂澂為首的這一主張，筆者稱之為「各藏同依蜀版說」。依據此說，各藏之底本關係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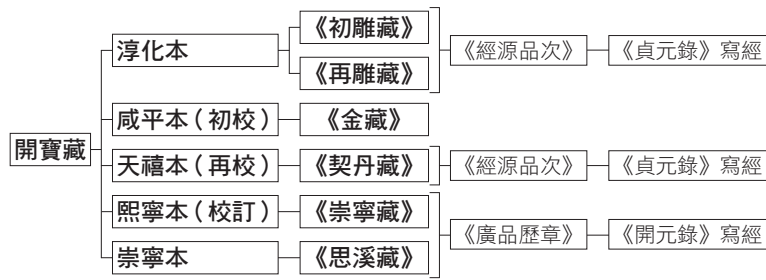


圖 2：各藏同依蜀版說

綜上所述，古今中外的刻本漢文大藏經之間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呈現出複雜的底本關係。就學界現有研究而言，主要可歸納為兩種觀點：「三地寫本各異說」與「各藏同依蜀版說」。相對而言，後者的論證較為周延，兼顧了刻本與寫本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故其結論更符合史實。若以之分析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新舊版本之情況，當能更清楚地揭示其傳承系譜與異文形成之歷史脈絡。

¹⁸ 李富華指出《開寶藏》分別於 999、1073、1108 年經行過增補（李富華 11）。顏洽茂則指出《初雕藏》所據底本是「淳化本」、「咸平本」，同時參照「天禧本」；《再雕藏》則以《開寶藏》諸修訂本與《契丹藏》、《初雕藏》互校而成（顏洽茂 157-159）。柳富鉉認為《初雕藏》、《趙城金藏》、《再雕藏》分別依據不同程度修改過的《開寶藏》而覆刻（柳富鉉 2002，123-124）。釋知如等人則以不同版本的《出曜經·念品》、《四分律·尼戒前二篇》及《本事經》進行異文比較，研究結果印證了呂澂「蜀版五印本」之說（釋知如 3-96；釋慧法 97-167；林恒卉 169-254）。

三、《再》與《宋元明》兩個舊版本

依據 Harrison 及 Jan Nattier 之研究，現存《般舟三昧經》並非純粹由支婁迦讖一人譯出，而是在他於 179 年譯出之後，經過某些校訂而成（Harrison 1990, 236-249; Nattier 76-83）。末本文美士進一步指出，此經〈行品〉中所描述的修行方法與理論，與〈四事品〉以後的內容存在諸多差異，顯示這些內容可能出自不同時代，並且經過多個階段的編纂與增補（末本文美士 141-145）。這些校訂的結果，可能是形成《再》、《宋元明》兩種版本的原因。《再》與《宋元明》的主要差異有三（Harrison 1990, 223-235；釋覺心 2020, 5-60）：

（一）序分

《再》和《宋元明》的序分有很大差異，前者只有 27 個字，後者卻有 102 個字：

表 2：《再》與《宋元明》序分之差異

版本	對應經文
《再》	佛在羅閱祇摩訶桓迦憐，摩訶比丘僧五百人，皆得阿羅漢，獨阿難未。 ¹⁹
《宋元明》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迦鄰竹園中，與大比丘眾比丘五百人，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塵垢，生死悉除，而得自在，心已解脫，照明於慧，譬如大龍，聖智通達，所作已辦，眾行具足，棄捐重擔，所欲自從，已捨諸有，其行平等，得制其心，度於彼岸。唯除一人，賢者阿難。 ²⁰

¹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5a04-a05。

²⁰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2（校勘注 4）。

由於以上差異極大，所以 Harrison（1990, 232）認為《再》和《宋元明》來自兩個不同的文獻傳承。

（二）長行與偈頌

從〈四事品第三〉至〈譬喻品第四〉的前半部分，《再》全是「長行」，而《宋元明》則結合了「長行」及「偈頌」。以〈四事品第三〉為例，兩者的差異極為明顯：

表 3：《再》「長行」與《宋元明》「偈頌」之差異

版本	對應經文
《再》	是三千國土，滿其中珍寶，施於佛，持用求佛。復有異人持是三昧者，是佛所稱譽。聞信者，其福倍多。 ²¹
《宋元明》	假使三千界 滿中珍寶施 供養佛世尊 以用求佛道 設復有比丘 聞是佛三昧 信樂而不疑 其福過彼上 ²²

《般舟三昧經》「長行」與「偈頌」所採用的譯語常有差異，似乎不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為了確認其譯者身分，最可靠的方法是將學界公認為支婁迦讖所譯的《道行般若經》與之進行比對。Nattier 和 Harrison 都做過相關研究。前者曾舉出幾個具代表性的例子（Nattier 81）：

表 4：《道行般若經》與《般舟三昧經》譯語之比對

對應梵文	T224	T418（長行）	T418（偈頌）
upāsaka	優婆塞	優婆塞	清信士
preta	薜荔	薜荔	餓鬼

²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1a13-a16。

²²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7（校勘注 18）。

niraya	泥梨	—	地獄
mahāsattva	摩訶薩	摩訶薩	大士
upāyakaśālya	漚和拘舍羅	—	善巧方便

針對同一個梵文字，《般舟三昧經》「長行」與《道行般若經》的譯語高度一致，因此 Harrison 推測兩者都出自支婁迦讖之手。若非同一人所譯，則譯者必定屬於支婁迦讖學派之人（Harrison 1990, 236-249）。此外，《般舟三昧經》「偈頌」之譯語顯然與眾不同。Harrison 與 Nattier 因此認為它是後人改譯或修訂的結果，並非支婁迦讖原譯。誰是其改譯或修訂者？可能性有二：吳·支謙或西晉·竺法護（Harrison 1990, 249）。

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般舟三昧經》的幾個「品名」，其譯語與「長行」及「偈頌」比較起來亦有所差異。以〈師子意佛品第十四〉及〈至誠佛品第十五〉為例：

表 5：《般舟三昧經》同一佛名之不同譯語

品名	長行	偈頌	對應梵文
師子意佛 ²³	私訶摩提（佛） ²⁴	私訶末（佛） ²⁵	Siṃhamati
至誠佛 ²⁶	薩遮那摩（佛） ²⁷	其至誠（佛） ²⁸	Satyanāma

²³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7 下 19。

²⁴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7 下 22。

²⁵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8 中 15。

²⁶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8 下 16。

²⁷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8 下 17。

²⁸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19 上 13。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其」，《宋元明》作「具」。

一梵文佛名，在漢譯本的品名、長行、偈頌中卻各個不同。如此看來，它們有可能分別出自三個不同人之手。換言之，支婁迦讖譯出《般舟三昧經》三卷之後，可能經過不止一次的修訂。每次修訂可能都由不同人（或團隊），在不同的年代完成。

（三）遣詞用字

《再》與《宋元明》之間約有 235 個遣詞用字上的微小差異。其原因可能源自異體字、同義字、白字、多字、漏字、衍字等。舉例而言：

表 6：《再》與《宋元明》遣詞用字之差異

《再》	《宋元明》	差異
彼羅斯大國 ²⁹	波羅斯大國 ³⁰	《再》誤抄
講受是三昧 ³¹	講誦是三昧 ³²	字異而意思相近
無不解 ³³	無不解者 ³⁴	《宋元明》多一字

Harrison 認為遣詞用字的差異，大體上是由於長期傳抄而逐漸形成。然而，「序分」及「長行與偈頌」的明顯差異，則屬刻意修訂的結果（Harrison 1990, 227）。

依據以上各種差異，Harrison 認為：支婁迦讖於 179 年譯

²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5a17。

³⁰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3 上 9（校勘注 4）。

³¹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3b12。

³²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9 中 4（校勘注 9）。

³³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5c10。

³⁴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3 中 13（校勘注 23）。

出的《般舟三昧經》三卷十六品為「A 本」。這最初的譯本有兩個特徵：省略了「聞如是」序文、將原典的「偈頌」漢譯為「長行」。可惜完整的「A 本」並未保存至今。目前只有《再》〈問事品第一〉至〈譬喻品第四〉前半段，屬於「A 本」的遺卷。到了 208 年，「A 本」經歷了全面的修訂，這項工作可能是由支婁迦讖學派的成員在其弟子支亮的主持下完成。³⁵「A 本」原以「長行」呈現的「偈頌」，重新被改為「偈頌」形式，而經首的序文也加上了「聞如是一時」，由此形成「B 本」。《再》〈譬喻品第四〉後半段開始直到經文結束，以及整部《宋元明》都屬於「B 本」，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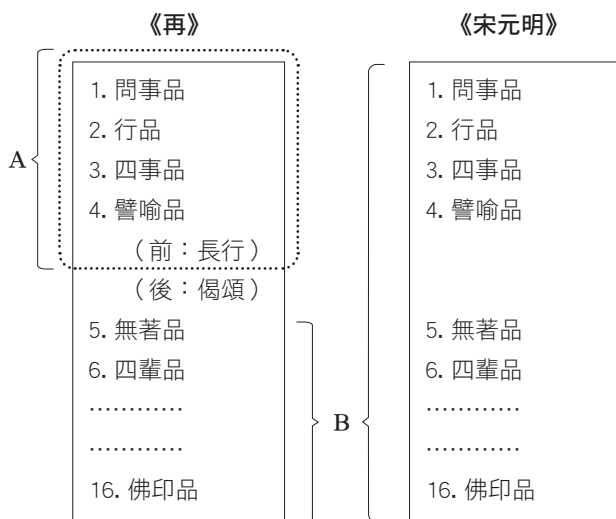


圖 3：《再》與《宋元明》結構之差異

³⁵ 《出三藏記集》：「《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佛朔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令後普著在。建安十三年（208），於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大正藏》冊 55，第 2145 號，頁 48 下 10-14）

由於文獻資料不足，因此無法確定「B 本」之形成是否參照過相關的印度原典（Harrison 1990, 270）。至於是誰及為何將 A 和 B 結合在一起而形成如《再》那般的版本，Harrison 提出這樣的推論：

當《高麗藏》的編輯者，也可能是比他們更早的遼或北宋時期的編輯者，在考慮《般舟三昧經》的漢譯版本時，他們手上擁有支婁迦讖原譯之殘片（修訂本 A）。他們將之與現存的修訂本 B 融合。然而在中國，若有任何更早的修訂本存在的話，它們會被各種漢譯大藏經的編輯者們忽略，最終一直採用修訂本 B。（Harrison 1990, 271-272）

Harrison 嘗試將《再》本形成的原因追溯至《高麗藏》、《契丹藏》或《開寶藏》的編輯者。對於這樣推論，Harrison 本身並未進行進一步考察或舉出任何文證。筆者認為此推論仍有商榷的餘地，其中有三個問題需要釐清：

1. Harrison 既然提到了《高麗藏》，卻未考察《校正別錄》，如何斷定 A 本和 B 本的結合出自其編輯者之手呢？
2. Harrison 雖提到《契丹藏》、《開寶藏》，但這兩部大藏經早已失傳。雖然近來有些遺卷被發現，但其中未見有《般舟三昧經》。因此，如何證明 A 和 B 的融合出自其編輯者之手呢？
3. 就《再》本而言，為何 A 和 B 的銜接點會發生在〈譬喻品第四〉的「中間」，而不從〈無著品第五〉開始？這一點頗不尋常。Harrison 推測這是因為

A 本的殘片只有初品至〈譬喻品第四〉的前半段，而這份殘片落入《高麗藏》、《契丹藏》或《開寶藏》編輯者手裡，因此才能將它與既有的 B 結合。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推論未免存有疑點：除非這些大藏經的編輯者覺得 B 的前三品半有些問題，或者其譯文比 A 殘片遜色，否則何以捨棄 B 的前三品半而以 A 殘片代替，進而影響譯文的一致性呢？

針對以上第一個問題，筆者發現《校正別錄·伐函》記載著守其當時所看到的《般舟三昧經》三個版本及其校勘。這是釐清 A 和 B 的融合是否出自《高麗藏》編輯者們之手的重要綫索。

針對第二、第三個問題，筆者認為透過《金》與《初》的研究有助於釐清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這個版本的前四品全是「長行」，其「序分」與《再》和《宋元明》亦不同。如果將梵文原典的「偈頌」漢譯為「長行」是支婁迦讖的特徵（Harrison 1990, 232），那麼《金》的前四品豈非全是支婁迦讖原譯？這一點對於釐清現存《再》的「A 本」和「B 本」為何銜接在〈譬喻品第四〉的「中間」，乃是重要線索。有鑑於此，以下先將《校正別錄》與《金》相關經文進行考察。

四、《校正別錄》與《趙城金藏》的新發現

（一）高麗·守其《校正別錄》（K1402）

高麗國沙門守其等人撰寫的《校正別錄》三十卷，是

《再雕藏》的校勘紀錄。³⁶ 其中，有關《般舟三昧經》的校勘記如下：

伐函 《般舟三昧經》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上卷二十一偈，何況守是三昧悉具足者下，佛尔時頌偈
曰等十六偈，今此「宋本」本無，而有長行十餘紙文。
詳其文相，與中卷〈無著品〉、〈四輩品〉文雖少異，
大旨無殊，則長行之文例無重疊，恐「宋本」錯將異譯
之文連書耳。故依「東北二本」，去彼同後重疊之文，
安茲頌前要略之偈云。又為看「舊宋藏」者，具錄所安
頌文于左：

佛尔時頌偈曰：

三千大千之國土	滿中珍寶用布施
設使不聞是像經	其功德福為薄小
.....	
.....	
常恒誦說是三昧	當從佛法世尊教
聞其種姓得等覺	如佛所歎無有異 ³⁷

以上偈頌是「宋本」和「東北二本」之間的唯一差異處，

³⁶ 《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30 卷，高麗國僧人守其等奉敕校勘，是現存《再雕高麗藏》的校勘記錄。全書收錄 69 部佛典的 77 篇校勘記。其中大乘經 19 部、大乘論 8 部、小乘經 16 部、小乘律 8 部、小乘論 7 部、賢聖集傳 5 部、《開元錄》後新入藏經典 6 部。此錄僅《高麗藏》收載。

³⁷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p. 515c14c23-516b10。

其餘部分皆同。此偈屬於〈譬喻品第四〉的最後一段文。相對於此，守其所見的「宋本」並非偈頌，而是「十餘紙」長行。這「十餘紙」的長行在守其看來，與〈無著品第五〉及〈四輩品第六〉的內容「文雖少異，大旨無殊」，也就是經文前後重複。守其因而覺得「宋本」的長行有問題，應是「錯將異譯之文連書」所致。基於這個原因，守其決定以「東本」和「北本」之偈頌，取代「宋本」之長行。

「東本」與「北本」所載偈頌，今尚可見於現存之《再》與《宋元明》。然而，守其所見「宋本」之長行，早已佚失。值得慶幸的是，筆者於《金》中發現了一段長行，內容與該佚文頗為相似。進一步將《金》所錄長行與「東本」、「北本」之偈頌加以對照，所得結果如下：

表 7：《金》與「東北本」之比對

項	《金》	東本=北本
1	時佛歎曰： 「一佛剎滿其中天金，悉持施與佛。不聞是三昧，是彼所言功德為少耳。」	佛爾時頌偈曰： 「三千大千之國土 滿中珍寶用布施 設使不聞是像經 其功德福為薄少
2	佛言：「菩薩欲得多功德者，是三昧當書、當學、當誦、當持、當守、為他人說，其功德不可計。」 佛言：「一佛剎滿其中塵，一塵分為一佛剎，其數爾所佛剎不可復計，滿其中珍寶悉布施。 其有從是三昧中學一章，從是經若學四章是三昧者，知佛所教。我說其功德譬喻了不可得崖底，何況書學誦持、為他人說者？若守須臾頃，其功德不可計、无有限。	若有菩薩求眾德 當講奉行是三昧 疾悉諷誦此經法 其功德福無有量 如一佛國塵世界 皆破壞碎以為塵 彼諸佛土過是數 滿中珍寶用布施 其有受持是世尊 四句之義為人說 是三昧者諸佛慧 得聞功德叵比喻 何況有人自講說 受持諷誦念須臾 轉加增進奉行者 其功德福無有量

	是閻浮提人民，悉令求佛智慧，悉清淨，悉曉了其智，其功德福甚大。我說是經中有持一章者，至於般泥洹說其功德不可極。持是三昧者教人，我說其功德若干億劫不能竟持是經中一章。 十方諸佛剎滿其中珍寶，持供養佛。 其有持是三昧者守行，若為人說，其功德勝於供養佛，我說其功德譬喻不可盡。	假使一切皆為佛皆於億劫過其數至於泥洹讚詠福不能盡究其功德 一切佛國所有地滿中珍寶以布施若有聞是三昧者安諦諷誦講說者	聖智清淨慧第一講說一偈之功德無數億劫悉歎誦於是三昧一偈事 四方四隅及上下用供養佛天中天得其福祐過於彼引譬功德不可喻
3	是菩薩為悉供養佛，以其人高明智廣。 卻後亂世時，有清淨持是三昧者。」	其人貢高終不起解了深法不疑結學士為以見奉吾增益信明為菩薩屬累汝等常勸教自勸勇猛勤修行其有誦受是三昧假使最後大恐懼	亦無有趨惡道時行斯三昧德如是德重精進普不著力學三昧佛所讚力行精進無放逸令得大道不復反已為面見百千佛持此三昧無所畏
4	佛言：「今我於是坐中豫見是比丘以。」 佛告長者毘陀和：「聞是三昧者，以清淨心為人說之。得是三昧以，是菩薩為高遠无比。 是經中亦有毘憐尼，佛所稱譽，其智如萬川四流歸大海，成作佛時如是。是三昧者，當堅守。是故佛所教，智者所稱譽，還得高明之經藏，我不豫說其限。」	行是比丘以見我 菩薩聞習三昧者菩薩得是三昧者 為逮總持佛稱譽常恒誦說是三昧聞其種姓得等覺	常為隨佛不遠離 義當受持為人說爾乃名曰博達慧 疾成佛道智如海當從佛法世尊教如佛所說無有異」

通過上述比對，可以總結出幾個重點：

1. 守其所見的「宋本」與《金》前四品都是「長行」，

而「東本」、「北本」只有前三品半是「長行」，與現存的《再》一致。

2. 依據守其的說法，他所見的「宋本」長行與〈無著品第五〉及〈四輩品第六〉的內容有某種程度的重疊。然而，《金》之長行並非如此，它與「東本」、「北本」的偈頌內容大部分一致。由此可見，《金》與守其所見的「宋本」並非同一個版本。
3. 依據上表第3項，《金》「卻後亂世時，有清淨持是三昧者」，顯然與「東本」、「北本」的對應文脈不合。考察整部《般舟三昧經》，有關佛般涅槃後「亂世時」的情形僅僅出現在〈授決品第七〉。³⁸ 由此可見，《金》或將〈授決品第七〉的經文錯置於此，而「東本」、「北本」或它們所依據的底本已將此錯誤校正。這是守其未提到的。
4. 依據上表第4項，《金》長行中的「陁憐尼」，在「東本」、「北本」的對應偈頌中卻採用「總持」這個譯語。釋印順認為「總持」為晉代常用的譯語，與支婁迦讖後漢的原譯語不同（釋印順 1981，840）。由此可以推測「東本」、「北本」的偈頌屬後人之作，而《金》之長行保留了較早的型態。
5. 守其所見的版本其實只有兩種：(1)「宋本」；(2)「東本」和「北本」同。他最終取用「東本」和「北

³⁸ 《般舟三昧經》：「毘陀和菩薩、羅隣那竭菩薩從坐起，正衣服，叉手於佛前，白佛：『佛般泥洹後亂世時，我曹共護是三昧……是經卷者我輩自共護持……。』時五百人從坐起，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叉手於佛前住，白佛：『佛般泥洹後亂世時，聞是三昧悉自持願護持。』」（《大正藏》冊13，第418號，頁911上10-22）

本」的偈頌來代替「宋本」的長行。問題是「宋本」、「東本」和「北本」指的是哪一種大正藏版本呢？要釐清此問題，有必要考察守其在校勘過程中採用的大藏經版本。

（二）「宋本」、「東本」、「北本」所屬大藏經

整體而言，守其在《校正別錄》提到的大藏經有多種，包括：宋本、國前本、國後本、中本、丹本、東本、北本、舊宋藏等（李能和 1967，672）。其中，「舊宋藏」指的是《開寶藏》，「宋本」則是收於《開寶藏》的版本（鄭正姬 38）。若依呂澂的研究，「宋本」為《開寶藏》「淳化本」；「丹本」則是收於《契丹藏》的版本，它源於《開寶藏》「天禧本」。³⁹

另外，「國本」指的是收於《初雕藏》的版本（以下簡稱「初雕本」）。然而，守其有時亦將「初雕本」區分為「國前本」與「國後本」。「國前本」指的是依據從高麗顯宗（1010-1031 在位）到至文宗 17 年（1063）傳入高麗的「宋版」為底本，版刻而成的「初雕本」；「國後本」則是「丹本」傳入高麗之後，以其為藍本，版刻而成的「初雕本」（鄭正姬 27）。換言之，「初雕本」前後有兩種版本。

至於守其在《般舟三昧經》校勘記提到的「東本」、「北本」，何梅認為二者是守其時代，流傳於高麗國內的經本（何梅 49）。然而，這樣的觀點仍有商討的餘地。縱觀

³⁹ 有關《契丹藏》之研究，可參考〈契丹大藏經略考〉（呂澂 1977b，207-214）、〈《契丹藏》與高麗佛教〉（王德朋 5-6）、〈論《高麗再雕藏》中所見的《契丹藏》〉（柳富鉉 2008，409-442）。

整部《校正別錄》，只有一處提到「東本」和「北本」，也就是在「伐函《般舟三昧經》三卷」之校勘。如果「東本」和「北本」代表不同的大藏經，為何只出現一次？難道它們是單獨流通的經本？依據藤本幸夫的研究，《校正別錄》卷首皆題有「沙門守其等奉勅校勘」，表示此錄不是守其一個人完成，而是以守其為中心，指揮一群學僧進行校正錄。校正的過程，諸學僧各別負責校勘一部分典籍。校勘完成後，他們把校勘錄全呈交給守其。守其對他們的校正錄加以考量之後，總結出來的就是《校正別錄》。值得注意的是，諸學僧的校勘錄可能用了不同的符號，守其在最後審查時才將它們統一。舉例而言，《再雕藏》第七冊之《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十九末，載有一篇「校正錄」，其中提到：

此經自下二卷，則丹藏所無，故今無可相校；而宋、鄉二本，此卷之中皆有三節之文，文斷義絕，難取解處。⁴⁰

同文也出現在《校正別錄》「虞函 大集經第五十九卷」，但有一個重要差異：

此經自下二卷，則丹藏所無，故今無可相校；而國、宋二本，此卷之中皆有三節之文，文斷義絕，難取解處。⁴¹

⁴⁰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大方等大集經》，K56 v7, p. 569b21-c2。

⁴¹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 514c10-c12。

載於《再雕藏》校正錄的「鄉本」，《校正別錄》卻改為「宋本」。由此可見，「鄉本」是某學僧所用的符號，而守其將之統一為「宋本」。同樣的道理，出現於《般舟三昧經》校正別錄的「東北二本」，應為某學僧所用的符號，守其忘了訂正而收入《校正別錄》。「東北二本」應相等於守其在〈羔函 魔逆經〉⁴²、〈谷函 大寶積經論四卷〉⁴³、〈惻國 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卷第三十二〉⁴⁴所採用的統一符號——「國丹二本」。換言之，「東本」指的是「東國本」，即「初雕本」；而「北本」指的是「丹本」（藤本幸夫 242-253）。

綜上所述，守其等人在校勘《般舟三昧經》時，是以「宋本」（《開寶藏》「淳化本」）為底本，對校「東本」（＝初雕本）與「北本」（＝丹本）。守其發現「宋本」有一個問題，即〈譬喻品第四〉最後一段「長行」與〈無著品第五〉、〈四輩品第六〉的內容有所重疊。他推測那是「宋本錯將異譯之文連書耳」。守其因此將「東北二本」之「偈頌」取代它。校正後的「宋本」，被用作《再雕藏》版刻的藍本。⁴⁵換言之，現存「再雕本」與守其所見的「東本」、

⁴²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 584c5。

⁴³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 594c20。

⁴⁴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 698a22。

⁴⁵ 守其撰寫《校正別錄》時，是以兩種方式進行校勘。第一、以「宋本」做為底本，並依據「國本」、「丹本」對「宋本」進行校勘修整。修整好的「宋本」被用作《再雕高麗藏》的版刻底本。第二、對於「宋本」未收或具有重大缺陷的經典，守其的解決方法有二：1. 以「國本」或「丹本」為底本，進行校勘修整後，做為版刻的底本；

「北本」同，而異於「宋本」。⁴⁶雖然「金本」與「宋本」一樣在〈譬喻品第四〉末保留了「長行」的形式，但「金本」之「長行」顯然有校正過的痕跡，與守其所見的「宋本」不同，這一點符合呂澂所說的《金藏》以「咸平本」為底本，改正了「淳化本」原有的一些錯誤。

Harrison 等學者只知道有《再》和《宋元明》兩個版本，為《大正藏》校勘所用。然而通過上述考察可知，比《再》和《宋元明》更早，還有兩個版本，即現存「金本」以及守其所見的「宋本」。「宋本」與「金本」的前四品都保留了「長行」的形式，可說比《再》更接近支婁迦讖之原譯。由此可以推測《再》的「A 本」和「B 本」之所以銜接在〈譬喻品第四〉的「中間」，是經過數次修訂的結果。從中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個修訂過程，其順序為：

表 8：諸版《般舟三昧經》之結構特徵

順序	特徵	略符
1. 宋本	前四品皆是「長行」，但有重抄之誤	A1-4 品 + B5-16 品
2. 金本	前四品皆是「長行」，錯誤已糾正	A1-4 品 + B5-16 品
3. 東、北、《再》	前三品半皆是「長行」	A1-3.5 品 + B3.5-16 品
4. 《宋元明》	十六品皆是「長行 + 偈頌」	B1-16 品

2. 採用新的登載本進行版刻，然後編入《再雕高麗藏》。顯然，《般舟三昧經》之校勘屬於第一種方式（柳富鉉 2002，130-131）。

⁴⁶ 依據守其《校正別錄》的記載，有些經典在「國本」、「宋本」、「丹本」皆有所差異，如：〈暎函 大樓炭經卷第一〉、〈渭函 十八部論〉、〈既函 辨正論第七卷〉等。由此可知，守其所見國本、宋本、丹本，乃是三種異版（鄭正姬 102-104）。

值得注意的是，守其當時並未親見完整的「B 本」（＝《宋元明》），所以「A 本」和「B 本」之融合不可能出自他們的手。守其見到的東本（初雕本）、北本（丹本）只有「前三品半」屬長行，因此「A 本」和「B 本」之融合，也不可能出自《初雕藏》和《丹藏》編輯者之手。如此看來，「A 本」和「B 本」融合，最早只能追溯到「宋本」或《開寶藏》的編輯者，但因資料不足，目前無法做進一步的推論。儘管守其等人未見過完整的「B 本」，但它當時是否已經存在？如果早已存在，為何守其沒有看到？若不存在，那麼完整的「B 本」是如何形成的呢？為了進一步釐清這些問題，以下將各版《般舟三昧經》之異文做更詳細的校勘，由此判斷它們之間的關係。

五、新舊版本之比對

（一）〈問事品第一〉之異文比對

這一品最重要的異文，出現在《般舟三昧經》的開端，旨在說明佛陀說法的時間、地點、對象、聽眾等細節。各版的差異如下：

表 9：〈問事品第一〉異文比對

經本	對應文脈
《再》	〔A〕佛在羅閱祇摩訶桓迦憐，摩訶比丘僧五百人，皆得阿羅漢，〔B〕獨阿難未。 ⁴⁷

⁴⁷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5a4-5。

《金》	〔C〕聞如是：一時，〔A〕佛在羅閱祇摩訶桓迦憐，摩訶比丘僧五百人，皆得阿羅漢，〔D〕无復塵垢，生死悉除，而得自在，心已解脫，照明於慧，譬如大龍，聖智通達，所作已辦，眾行具足，棄捐重擔，所欲自從，已捨諸有，其行平等，得制其心，度於彼岸，〔B〕獨阿難未。 ⁴⁸
《宮》 《磧》 《宋》 《元》 《明》	〔C〕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迦鄰竹園中，與大比丘眾比丘五百人，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D〕無復塵垢，生死悉除，而得自在，心已解脫，照明於慧，譬如大龍，聖智通達，所作已辦，眾行具足，棄捐重擔，所欲自從，已捨諸有，其行平等，得制其心，度於彼岸，唯除一人，賢者阿難。 ⁴⁹
《初》	（經文脫落） ⁵⁰

這段序文竟有三種版本：1.《再》；2.《金》；3.《宮》、《磧》、《宋元明》。守其在《校正別錄》並未提到「國本」、「東本」、「北本」的序文有所差異，因此只能推測他看到的三個版本皆如現存「再雕本」。若是如此，則《金》應與《再》同，但據以上比對，兩者卻有所差異。仔細分析《金》的文脈，可以發現它結合了《再》〔A〕、〔B〕與《宋元明》〔C〕、〔D〕之文脈。何以出現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有兩個可能性：1.《金》之「金刻金印」原與《再》一致。然而到了元代，《金藏》曾補雕過一次。這次補雕，可能參校了《宋》、《元》等版本，因而將後者的經文融入了原來的版本中。現存廣勝寺本屬「金刻元印」（李富華、何梅 108-109），因此保留了元初補雕的痕跡；2. 元初補雕並未改變這一段內容，而是出自現代《金藏》編

⁴⁸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1 中。

⁴⁹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2 下 27（注 4）；《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97 上 4-9；《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

⁵⁰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 行 1-18。

輯者之手。他們發現第一版頁文字大部分脫落，因此剪輯《金藏》別處的文字補上。這個這一點，從它前後不太一致的版式中可以看出：



圖 4：《金》第一版頁：一行 19 或 20 字⁵¹

第二版頁只有一行 14 字（偶有 15 字），可說保留了「金刻金印」的原始狀態，與《開寶藏》每版 23 行，行 14 字之行款一致。然而，第一版頁的字體明顯縮小，以至於一行可以容納 19 或 20 字。或許唯有這樣，才能將《再》27 字的序分：「佛在羅閱祇摩訶桓迦憐……獨阿難末」與《宋元明》長達 102 字的「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迦鄰竹園中……唯除一人，賢者阿難」彙整在一起，形成《金》獨有的 92 字版。

⁵¹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1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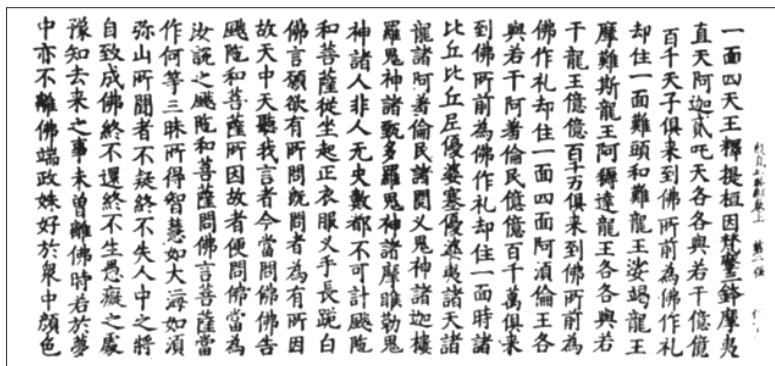


圖 5：《金》第二版頁：一行 14 字（偶有 15 字）⁵²

以上兩種可能性，哪一個比較符合實際情況？首先，察閱《中華藏》的校勘範例，其中提到：「《中華藏》的底本以《趙城金藏》為主；若《趙城金藏》缺佚，則以《高麗藏》等做底本。各卷所用底本及相關問題皆在校勘記的第一條中說明。」⁵³ 接著，查閱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的校勘記第一條，寫著：「底本，金藏廣勝寺本。」⁵⁴ 進一步查閱上述「序分」的校勘記，其中並未說明《中華藏》的編纂者用其他經版補《金》之缺損，而且還多處注明《金》與《再》、《資》、《磧》、《南》等版本種種差異處。然此看來，《金》的第一版頁應非《中華藏》的編纂者修補的結果。換言之，以上第一種可能性，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⁵²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1 下。

⁵³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943 上。

⁵⁴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30 下。

（二）〈行品第二〉之異文比對

這一品有兩段異文。第一段異文的內容，旨在說明念佛者之所以能夢見佛，正如男子晝夜憶念姪女，而在夢中見之。各版本的差異如下：

表 10：〈行品第二〉異文比對之一

經本	對應文脈
《金》 《再》	辟若有人聞墮舍利國中有姪女人名須門，若復有人聞姪女人阿凡和梨，若復有人聞優陂洹作姪女人。是時，各各思念之。 ⁵⁵
《初》	辟如有人聞墮舍利國中有姪女人名須門，若復有人聞姪女人阿凡和利，若復有人聞優婆洹作姪女人。是時，各各思念。 ⁵⁶
《宮》 《磧》 《宋》 《元》 《明》	譬如有人聞墮舍利國中有姪女人名須門，若復有人聞姪女人阿和利 ⁵⁷ ，若復有人聞優婆洹作姪女人。是時，三人皆在羅闍念。 ⁵⁸

其中的差異有三：1.《金》、《再》之「若」，其他版本皆作「如」；2.《金》、《再》之「陂」，餘者皆作「婆」；3.《金》、《再》的「各各思念之」，《初》減少

⁵⁵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4 中 16-18；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8a18-21。

⁵⁶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0 行 1-4。「譬」字，《初》作「辟」，以下皆同，不另作說明。

⁵⁷ 「阿和利」，《磧》作「阿凡和利」。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作「阿凡和利」。

⁵⁸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5 上 27- 中 1（校勘注 12-15）；《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99 上 10-12；《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2。

了「之」字，作「各各思念」；《宮》、《磧》、《宋》、《元》、《明》則有明顯的變化，作「三人皆在羅閱念」，差距相當大。由此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三種版本，其形成順序為：《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第二段異文出現在重頌之前，比較如下：

表 11：〈行品第二〉異文比對之二

經本	對應文脈
《金》	佛說偈 ⁵⁹
《初》《再》	佛尔時頌偈曰 ⁶⁰
《宮》《磧》《宋》《元》《明》	佛尔 ⁶¹ 時頌偈言 ⁶²

此處同樣可以看出三種不同的版本，但與上一段校勘稍有差異，即：1.《金》；2.《初》、《再》；3.《宮》、《磧》、《宋》、《元》、《明》。其中，《金》以最簡潔的形式出現，只有「佛說偈」三字；《初》與《再》同，增加為六字：「佛尔時頌偈曰」；《宮》《磧》《宋》《元》《明》則改前者的「曰」為「言」字。

⁵⁹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5 中 20。

⁶⁰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3 行 7；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9a23。

⁶¹ 「尔」，《磧》同。依據《大正藏》內文，《再》、《宋》、《元》、《明》作「爾」。以下皆同。

⁶²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6 上 7（校勘注 1）；《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99 下 12；《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5。

(三) 〈四事品第三〉之異文比對

這一品有三段異文。第一段異文主要是體例的差異，一者是長行，一者是偈頌，如下所示：

表 12：〈四事品第三〉異文比對之一

經本	對應文脈			
《金》 《再》	時佛說偈而歎曰：「常當樂信於佛法，誦經念空莫中止，精進除睡臥，三月莫得。坐說經時安諦受學極當廣遠，若有供養饋遺者莫得喜，无所貪慕得經疾。……如是教當堅持，諸經法悉當隨是入，是為諸佛之道徑，如是行者，今得三昧不久。」 ⁶³			
《初》 《宮》 《磧》 《宋》 《元》 《明》	佛尔時頌偈曰：	常信樂於佛法	受誦是道德化	精進行解深法
		當普說佛經理 ⁶⁴	廣分布道法教	慎无 ⁶⁵ 得貪供養
				
	常恭敬於法師	當奉事如世尊	無得惜是經法	得三昧疾不久
	慎無得疑斯經	佛讚是正道化	一切佛所歌歎	得三昧疾不久 ⁶⁶

《金》與《再》同，兩者皆將原典的「偈頌」漢譯為「長行」。相對於此，其餘的版本皆以「偈頌」的形式呈

⁶³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5 下 19-426 上 16；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29b22-c19。

⁶⁴ 「經卷」，《宮》、《初》、《磧》同。依據《大正藏》校勘，《宋》作「經理」，《元》《明》作「經卷」。

⁶⁵ 「无」，《宮》、《磧》、《初》同。依據《大正藏》內文，《再》、《宋》、《元》、《明》作「爾」。以下皆同。

⁶⁶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4 行 6- 頁 15 行 7；《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6 上 28- 中 17（校勘注 6-7）；《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100 上 1-25；《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6-17。

現。值得注意的是，守其在《校正別錄》未提及這段異文。由此可以推測守其當時手上並未擁有《宮》等版本，而且他所見的「東本」（初雕本），與現存的《初》不同。

第二段異文的內容旨在說明見十方佛，但各版本在數量上卻產生分歧，如下所示：

表 13：〈四事品第三〉異文比對之二

經本	對應文脈
《金》《再》	東向視見若干百佛，若干千佛，若干万佛，若干億佛。 ⁶⁷
《宮》《初》《磧》 《宋》《元》《明》	東向視若干百千佛，若干百万 ⁶⁸ 佛，若干百億佛。 ⁶⁹

《金》與《再》同，而異於《初》、《宮》、《磧》、《宋》、《元》、《明》。除了少了一個「見」字外，後者對見佛的數量明顯做了一些改變，即：「百佛、千佛、万佛、億佛」→「百千、百万佛、百億佛」。同樣的，守其《校正別錄》未提及這段異文。

第三段異文主要是體例的差異，一者是長行，另一者則以偈頌呈現，如下所示：

⁶⁷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6 中 1-3；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0a4-5。

⁶⁸ 「万」，《金》、《再》、《宮》同，《初》《磧》作「萬」，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作「萬」。以下皆同。

⁶⁹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5 行 15-16；《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6 中 25-26（校勘注 12-15）；《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100 中 2-3；《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7。

表 14：〈四事品第三〉異文比對之三

經本	對應文脈
《金》 《再》	時佛歎曰：「如淨眼人夜半上向視星宿不可計，晝日思念悉見。菩薩如是逮得三昧者，見不可復計百千佛，從三昧中覺以悉念見，自恣為諸弟子說。」佛言：「如我眼清淨，常見於世間，菩薩如是得三昧以，見不可復計佛……常有極大慈，棄捐世俗事，常樂持經施，用是故清淨，得三昧不久。」 ⁷⁰
《初》 《宮》 《磧》 《宋》 《元》 《明》	佛爾時頌偈曰： 「譬如有人眼清淨 於夜中半而起觀 仰見星宿無數千 晝日思念皆識知 當信三昧疾持行 悉棄世間諸所有 常樂斯經行法施 疾得清淨寂定地」 ⁷¹

此處異文的性質，與〈四事品第三〉所見的首筆異文相同，即《金》與《再》皆將梵文原典中的偈頌譯為長行，而其餘諸本則保留為偈頌形式。如此顯著的差異，《校正別錄》卻未予指明。據此可合理推測，守其當時並未見及《宮》等版本，其所據之「東本」，與現存之《初》版本並不相同。

⁷⁰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6 中 8- 下 3；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0a11-b6。

⁷¹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5 行 21- 頁 16 行 15；《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6 下 1-11（校勘注 18-19）；《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100 中 7-23；《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7-18。

（四）〈譬喻品第四〉之異文比對

這一品有三段異文。第一段異文體現在文字的增減，但經意不變，如下所示：

表 15：〈譬喻品第四〉異文比對之一

文本	對應文脈
《金》	是彼不知愧，為自作經耳，非佛所說。 ⁷²
《再》《初》《宮》 《宋》《元》《明》	是彼不知愧，為自作是經耳，是經非佛所說。 ⁷³

《金》的譯文自成一格，與《再》、《初》等諸版本皆不同。此中有兩筆異文：1.《金》「為自作經耳」，餘者皆作「為自作是經耳」，增加了一個「是」字；2.《金》「非佛所說」，餘者皆作「是經非佛所說」，增加了「是經」二字。如果說《金》和《再》同為《開》的覆刻，兩者應當一致，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再》等諸版多出「是」與「是經」，為《金》所缺。由此可見，《金》的文句有被修訂過的痕跡。加上「是」與「是經」之後，不僅使文句更為通順，義理亦更為明晰易懂。

第二段異文主要是體例的差異，一者是長行，一者是偈頌，如下所示：

⁷²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7 中 4-5。

⁷³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8 行 15-17；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1a7-8；《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7 中 18-19；《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101 上 2-3；《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19。

表 16：〈譬喻品第四〉異文比對之二

文本	對應文脈
《金》 《再》	時佛歎曰：「是三千國土，滿其中珍寶施於佛，持用求佛。復有異人持是三昧者，是佛所稱譽。聞信者，其福倍多……若持戒堅者，常正心恭敬於經。我用是故，為是人說耳。」 ⁷⁴
《初》 《宮》 《磧》 《宋》 《元》 《明》	佛爾時頌偈曰 ⁷⁵ ： 「假使三千界 滿中珍寶施 供養佛世尊 以用求佛道 …………… 奉禁戒清淨 受法諷誦利 執經普講說 則具足道義」 ⁷⁶

《金》與《再》同，而異於《初》、《宮》、《磧》、《宋》、《元》、《明》。守其《校正別錄》未提及這段異文。由此可以推測守其當時手上沒有《宮》等版本，而且他所見「東本」（高麗初雕本），與現存《初》並不一樣。現存《初》卻與《宮》等一致。

第三段異文同樣是體例的差異，一者是長行，另一者則是偈頌，如下所示：

⁷⁴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7 中 10-23；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 931a13-b3。

⁷⁵ 「曰」，《初》同，《宮》、《磧》作「言」。《大正藏》作「時佛歎曰」，但校勘欄沒有註明《宋》《元》《明》有異，讓人誤以為《再》與《宋》《元》《明》同。事實上，《宋》《元》《明》作「佛爾時頌偈曰」。

⁷⁶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18 行 22- 頁 19 行 10。《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7 中 24- 下 7（校勘注 17-18）；《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7-18；《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20。

表 17：〈譬喻品第四〉異文比對之三

經本	對應文脈
《金》	時佛歎曰：「一佛剎滿其中天金，悉持施與佛。不聞是三昧，是彼所言功德為少耳。」佛言：「菩薩欲得多功德者，是三昧當書、當學、當誦、當持、當守、為他人說，其功德不可計……是三昧者當堅守，是故佛所教，智者所稱譽，還得高明之經藏，我不豫說其限。」 ⁷⁷
《初》	佛爾時頌偈曰 ⁷⁸ ：
《再》	「三千大千之國土 滿中珍寶用布施
《宮》	設使不聞是像經 ⁷⁹ 其功德福為薄少
《磧》	
《宋》	若有菩薩求眾德 當講奉行是三昧
《元》	
《明》	常恒誦說是三昧 當從佛法世尊教
	聞其種性 ⁸⁰ 得等覺 如佛所歎 ⁸¹ 無有異」 ⁸²

《金》與眾不同，將原典的偈頌譯為「長行」，餘者皆以「偈頌」呈現。如前所述，守其在《校正別錄》提到這段

⁷⁷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頁 428 上 6- 中 14。

⁷⁸ 「曰」，《初》、《再》同，《磧》作「言」。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作「言」。

⁷⁹ 「像經」，《宮》、《初》、《再》同，《磧》作「經像」。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作「經像」。

⁸⁰ 「性」，《宮》、《磧》同，《再》、《初》作「姓」。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同。

⁸¹ 「歎」，《宮》、《磧》、《初》同，《再》作「說」。依據《大正藏》校勘注，《宋》、《元》、《明》同。

⁸²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頁 20 行 17- 頁 22 行 4；불고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K67 v7, pp. 931c10-932a19；《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頁 908 上 9- 中 12（校勘注 7-20）；《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頁 101 中 13- 下 15；《宮本大藏經》第 1059 帖，頁 21-22。

異文：「佛尔時頌偈曰等十六偈，今此『宋本』本無，而有長行十餘紙文。詳其文相，與中卷〈無著品〉、〈四輩品〉文雖少異，大旨無殊，則長行之文例無重疊，恐『宋本』錯將異譯之文連書耳。故依『東北二本』，去彼同後重疊之文，安茲頌前要略之偈。」⁸³ 換言之，守其看到的「宋本」，其「長行」誤將〈無著品〉、〈四輩品〉的經文抄寫於此，他於是將「東北二本」（「丹本」與「初雕本」）的「偈頌」取而代之。

從上述異文看來，《金》以「長行」呈現，與守其所見的「宋本」一致，但是其內容並未與〈無著品〉、〈四輩品〉有所重疊。換言之，「宋本」與《金》雖都是「長行」，但兩者有所差異。若依呂澂的說法，守其看到三個版本：1.「宋本」為《開寶藏》「淳化本」；2.「北本」即「丹本」，底本為《開寶藏》「天禧本」；3.「東本」即「初雕本」，最初以《開寶藏》「淳化本」為底本，後來又依「天禧本」、「熙寧本」補刻。如此看來，守其唯獨未看到「咸平本」，即《金》據以刊刻者。換言之，「淳化本」與《金》同樣是「長行」，但前者所見之訛誤，已於後者中獲得修正。由此可以看出，諸版之間存在著一個修訂過程，即：守其所見「宋本」→《金》→「東本」、「北本」→《初》、《再》、《宮》、《磧》、《宋》、《元》、《明》。在這個過程中，錯誤可謂越來越少，同時也有些「長行」逐漸被改為「偈頌」。

⁸³ 見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K1402 v38, p.515c14c23-516b10。

六、結論

支婁迦讖於 179 年譯出《般舟三昧經》三卷，現存於若干漢文大藏經中，但 Harrison 等學者迄今所掌握者僅有《再》與《宋元明》兩種版本。根據他們的推論，支婁迦讖原譯本（A 本）之特徵，在於將原典中之「偈頌」譯為「長行」。「A 本」後來歷經修訂或重譯，除「序分」與遣詞用字多所改易外，原先由梵文「偈頌」譯為「長行」者，也被復原為「偈頌」形式，遂成「B 本」。完整的「A 本」已佚失，如今僅存「前三品半」。此殘卷可能流入北宋《開寶藏》、《高麗藏》或《契丹藏》編纂者手裡，因而與「B 本」合併，並保存在《高麗藏》中。惟中國後期諸藏之編纂，將「A 本」忽略，只保留「B 本」。筆者認為這樣的推論有些問題，原因在於《再》「A 本」與「B 本」的合併點出現在第三品半，影響整體經文的一致性。除非當時的編輯者認為「A 本」的譯文優美，否則這樣的合併顯得不太合理。本文根據《校正別錄》、《趙城金藏》與《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所見三種新版本，嘗試還原《般舟三昧經》在傳播過程中形成的版本源流。

守其在《校正別錄》提到「宋本」（開寶藏本）、「東本」（初雕本）、「北本」（丹本）。它們之間有一個重要差異，即〈譬喻品第四〉的最後一段文，在「宋本」為「長行」，在「東北二本」則是「偈頌」。「宋本」的「長行」有重抄之誤，故守其以「東北二本」的「偈頌」取代之。本文發現《金》的對應文脈亦為「長行」，與「宋本」一致，但它已將「宋本」重抄的錯誤改正。Harrison 等學者只知道《再》前三品半是長行，屬於支婁迦讖原譯，但本文發現《金》與「宋本」前四品皆為長行，其形成時間應早於

《再》，更接近支婁迦讖原譯之風貌。從時間順序來看，這些版本的成立順序應為：「宋本」→《金》→《再》（=東北二本）→《宋元明》。

接著，本文進一步以《金》、《初》、《再》、《宮》、《磧》、《宋元明》的前四品進行校勘，從中發現九筆重要異文：

表 18：《般舟三昧經》前四品異文比對結果

品	項	異同
問事品第一	1-1	《金》≠《再》≠《宮》《磧》《宋》《元》《明》
行品第二	2-1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2-2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四事品第三	3-1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3-2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3-3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譬喻品第四	4-1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4-2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4-3	《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透過上表，可以總結出三個重點：1.《宮》、《磧》、《宋元明》的經文全部一致，可謂屬於同一個系統。相對於此，《金》無一處與《初》、《宮》、《磧》、《宋元明》同，將之視為另一個不同的系統未嘗不可；2. 其次，《再》有五處與《金》同（2-1、3-1、3-2、3-3、4-2），一筆與眾不同之處（1-1）、一處與《初》同（2-2）、兩處與《初》、《宮》、《磧》、《宋元明》同（4-1、4-3）。從關係的緊密度而言，《再》最接近《金》，接著是《初》，最後是《宮》、《磧》、《宋》、《元》、《明》；3.《初》絕大部分的文句與《宮》《磧》《宋元明》同，只有一處與眾不同（2-1），一處獨與《再》同（2-2）。同樣

是《高麗藏》的版本，《初》與《再》卻有許多差異，可見《初》與守其所見的「東本」並不相同。由此可以推測《初雕藏》有過幾次校訂。人民出版社輯刊的《初》，應非《初雕藏》最初的版本，而是後期之作，明顯受到《開寶藏》「熙寧本」的影響。總而言之，這些版本具有一定的演變過程，即：《金》→《再》→《初》→《宮》、《磧》、《宋元明》。

綜上所述，支婁迦識譯《般舟三昧經》現存多種版本，是長時間校訂之結果，其演變順序應為：「宋本」→《金》→「東本」（初雕本）、「北本」（丹本）、《再》→《初》→《宮》、《磧》、《宋元明》。透過呂澂所提出的「各藏同依蜀版說」及「蜀版至少有五印本說」，方能合理地統攝《般舟三昧經》新舊版本之傳承系譜，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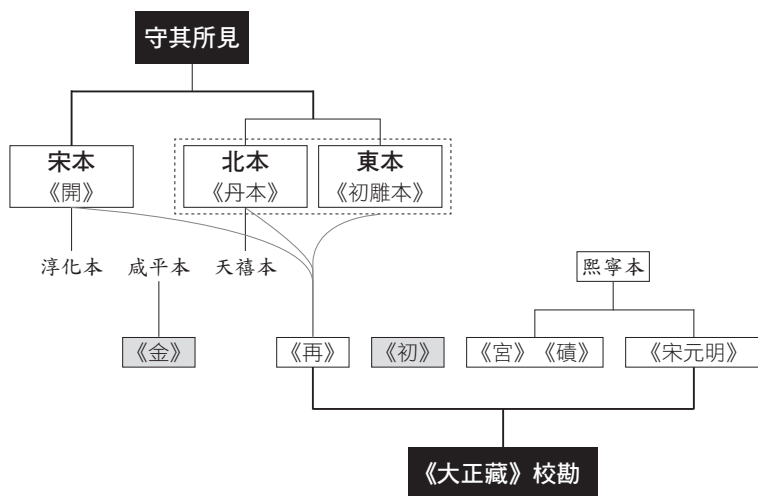


圖 6：《般舟三昧經》版本傳承系譜

由是觀之，支婁迦讖譯出的《般舟三昧經》，在漢文大藏經的版刻與印刷史中，至少出現過四種版本：

第一種：前四品皆為長行體，為《開寶藏》「淳化本」所據，守其在《校正別錄》稱之為「宋本」。該版本之第四品末有一段長行，其中有一段因抄寫失誤而出現的重複內容。惟此版本今已亡佚，無法窺探其原貌。

第二種：前四品亦皆為長行體，為《開寶藏》「咸平本」之所據，已將「淳化本」重複抄寫的錯誤糾正，《金》依之刊刻。守其並未見過此版本。

第三種：前三品半為長行，其餘部分則採長行與偈頌結合之體例，為《開寶藏》「天禧本」所據，與守其《校正別錄》所載「東本」、「北本」相符，現行《再》據此刊刻。

第四種：全經十六品皆採長行與偈頌結合之體例，為《開寶藏》「熙寧本」所依據，後世的《初》、《宮》、《磧》、《宋元明》皆依之刊刻。守其亦未見過此版本。

本研究成果突破了過往 Harrison 等學者認為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僅有《再》與《宋元明》兩種版本的局限，揭示出此譯本更多層次的校訂型態。此發現為《般舟三昧經》版本演變帶來更全面的理解。然而，本文也有其局限，例如未就各種異文進行漢語歷史語言學與譯經風格的系統對比與分析，否則在異文成立順序的論證將會更完整。此部分可做為後續研究之深化方向。

引用文獻

一、經典文獻或古籍

-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大正藏》冊 13，第 416 號。
《佛說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7 號。
《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 13，第 418 號。
《拔陂菩薩經》，《大正藏》冊 13，第 419 號。
《出三藏記集》，《大正藏》冊 55，第 2145 號。
《開元釋教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
《般舟三昧經》，《中華大藏經》冊 11，第 74 號，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般舟三昧經》，《宋版磧砂大藏經》冊 7，第 69 號，上海：延聖院大藏經局編，1987 年。
《般舟三昧經》，《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5，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委會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二、研究文獻

- 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臺北：新文豐，1975 年。
小川貫式著，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委會譯：《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臺北：華宇，1984 年。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1983 年。
山田龍城著，許洋主譯：《梵語佛典導論》，臺北：華宇，1988 年。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宋史》卷 487，〈列傳第二百四十六·外國三·高麗〉，<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37674>，2025.5.9。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3 年。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6 年。
- ：〈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世界宗教研究》，第 1 期，2012 年，頁 32-41。
- ：〈數位化時代的古籍整理〉，《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15 年，頁 4-8。
- 日本宮內省書寮藏本：《般舟三昧經》，《宮本大藏經》第 1059-1061 帖，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bib_frame?id=007075_0069，2025.3.28。
- 水野弘元著，劉欣如譯：《佛典成立史》，臺北：東大，1996 年。
- 王德朋：〈《契丹藏》與高麗佛教〉，《蘭台世界》，第 18 期，2012 年，頁 5-6。
- 末本文美士、宣方等譯：〈《般舟三昧經》：形成史與思想史若干問題之研究〉，《華林》，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41-145。
- 石上善應：〈大藏經的課題和文化史上的意義——以增上寺三大藏經為中心〉，《佛學研究》，第 3 期，1994 年，頁 1-5。
- 任繼愈：〈序〉，《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16。
- 西義雄：〈般舟三昧の研究資料と其の意義に就ついて〉，《惠古先生古稀記念「淨土教の思想と文化」》，京都：佛教大學，1972 年，頁 1265-1286。
- 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
- 呂澂：〈宋藏蜀版異本考〉，《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a 年，頁 195-206。
- ：〈契丹大藏經略考〉，《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b 年，頁 207-214。
-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臺北：里仁書局，1985 年。
- ：《歷朝藏經略考》，臺北：大千文化，2003 年。
- 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下篇），首爾：慶熙出版社，1967 年（據 1918 年初刊本的影印重刊本）。
- 李富華：〈《開寶藏》研究〉，《普門學報》，第 13 期，2003

- 年，頁 1-16。
-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3 年。
- 李圓淨：〈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述〉，《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 年，頁 93-104。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宮本大藏經》，<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KUNAICHO/tagged/0271018.dat&back=1>，2025.6.18。
- 周叔迦：〈大藏經印源流紀略〉，《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 年，頁 67-92。
- 林恒卉：〈《本事經》〈卷三〉之校勘——以初金再思磧新諸藏經版本暨可洪、慧琳音義等之考察〉，《正觀》，第 95 期，2020 年，頁 169-254。
- 林純教：《藏文和譯般舟三昧經》，東京：大東，1994 年。
- 竺沙雅章：〈漢文大藏經の歴史：特に宋元版大藏經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第 37 期，2002 年，頁 1-31。
- 柳富鉉：〈《高麗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獻季刊》，第 4 期，2002 年，頁 117-135。
- ：〈論《高麗再雕藏》中所見的《契丹藏》〉，《藏外佛教文獻》，第 2 編，總第 11 輯，方廣錫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409-442。
- 香川孝雄：〈カダリック出土 *Bhadrāpāla-sūtra* の梵文斷簡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0 期，1962 年，頁 199-203。
- 宮崎展昌：《大藏經の歴史：成り立ちと伝承》，京都：方丈堂，2019 年。
- 高楠順次郎等編纂：《昭和法寶總目錄》，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 年。
-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委會編：〈高麗經初刻本存卷數目表〉，《高麗大藏經初刻本輯刊》冊 8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320-368。
- 望月信亨：《支那淨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館，1942 年。

淨土宗大本山増上寺所藏三大藏：https://jodoshuzensho.jp/zojoji_sandaizo/，2025.6.16。

野沢佳美：《印刷漢文大藏經の歴史：中国・高麗篇》，東京：立正大學品川図書館，2017年。

梶浦晉：〈日本的漢文大藏經收藏及其特色——以刻本大藏經為中心〉，方廣鋁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二編，總第十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萬金川：〈《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2015年，頁93-114。

——：〈《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正觀》，第91期，2019年，頁5-22。

葉恭綽：〈歷代藏經略考〉，《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年，頁49-66。

蔡耀明：《佛教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資訊》，臺北：法鼓文化，2006年。

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張曼濤主編，臺北：大乘文化，1977年，頁215-270。

鄭正姬：《高麗再雕大藏目錄之研究》，1990年，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顏洽茂：〈《高麗大藏經》及其文獻價值〉，《中華文史論叢》，第63輯，李國章、趙昌平主編，上海：古籍，2000年。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大方等大集經》，K56 v7, p. 569b21-c2。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般舟三昧經》，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IT_K0067，2025.3.28。

불교기록문화유산아카이브（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再雕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IT_K1402_T_001&imgId=038_0515_c，2025.3.28。

藤本幸夫：〈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について〉，《中國佛教石經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6年，頁

242-253。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1981年。

——：《華雨集》第二冊，新竹：正聞，2005年，初版四刷。

釋知如：〈《可洪音義》所出〈《出曜經·念品》音義〉之校勘〉，《正觀》，第95期，2020年，頁3-96。

釋知如等：〈《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專題·序言〉，《正觀》，第95期，2020年，頁5-11。

釋慧法：〈釋慧法《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以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出詞條為主〉，《正觀》，第95期，2020年12月，頁97-167。

釋覺心：《《般舟三昧經》「除睡眠」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20年。

——：《《般舟三昧經》之起源與傳播研究》，2022年，法鼓文理學院，博士論文。

櫻部建：〈般舟三昧經管見：一卷本と三卷本との關連について〉，《橋本博士退官記念佛教研究論集》，大阪：清文堂，1975年，頁173-180。

CBETA：〈《高麗大藏經》影印本問題〉，<https://www.cbeta-org-tw.cbeta.org/data/news/200411/index.htm>，2026.7.20。

Fang, Guangchang. “Defining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ts Origin, Periodization, and Future.” *Reinventing the Tripitaka: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Modern East Asia*, trans. Xinzi and Jiang Wu, eds. Wu, Jiang and Greg Wilkinson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7, pp. 187-215.

Harrison, Paul M. “Buddhānusmṛti in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m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6, no. 1, 1978, pp. 35-57.

——. *The Samādhi of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Buddhas of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m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with Several Appendic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xt*,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5, Tokyo: The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0.
- Harrison, Paul M. et al.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Manuscript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no. 4, 2018, pp. 117-143.
- Hoernle A. F.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Reprinted 2019, pp. 88-93.
- Li, Fuhua and Mei He. “A Brief Survey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Spreading Buddha’s Word in East Asia: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eds. Wu Jiang a and Lucille Ch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11-320.
- Nattier, Jan.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8.

A Study of Three Newly Discovered Editions of *Pratyutpanna-samādhi Sūtra* Translated by Lokakṣema

Juexin Sh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the *Pratyutpanna-samādhi Sūtra* translated by Lokakṣema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It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which has largely concentrated on two major textual lines from the Jaejo Goryeo and Song-Yuan-Ming can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examines three lesser-studied versions: the Song Version recorded in the Jiaozheng Bie Lu, the Jin Version preserved in the Zhaocheng Jin Zang, and the Chojo Version from the Chojo Goryeo Cano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versions and reference to the genea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inti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his paper reassesses Paul Harrison's 1990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and fusion between Version A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by Lokakṣema) and Version B (a later redaction). Three key findings emerge from this study: (1) The first four chapters of the Song and Jin versions appear in *prose form*, suggesting closer alignment with Lokakṣema's original translation; (2)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Pratyutpanna-samādhi Sūtra* likely reflects a prolonged process of editorial revision, with a gener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Song → Jin → Eastern, Northern & Jaejo → Chojo → Song-Yuan-Ming; (3) Harrison's proposed "Redaction A" may never have existed as a discrete text. The structural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first three and a half chapters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Jaejo version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termediate version that had not yet undergone complete revision. Overall, by bringing to light three previously overlooked versions and re-evaluating earlier assumptions, this paper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Pratyutpanna-samādhi Sūtra* and helps to fill a significant gap in current scholarship.

Keywords

Lokakṣema, Pratyutpanna-samādhi Sūtra, textual versions, Jiaozheng Bie Lu, Zhaocheng Jin Zang